

# 逆向全球化:西方国家的认同危机

江宁康

(南京大学 外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近年来逆向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发达国家蔓延,它是相关国家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遭遇挑战后的非理性反应,也是其国家认同面临严重危机的显著症候。在后西方时代的世界格局上,逆向全球化思潮无法扭转经济全球化的积极进程,却会导致相关国家在内部的认同裂变和社会冲突中遭受更大的挫折。

**关键词:**逆向全球化;国家认同;后西方时代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7)05-0032-09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5.004

江宁康. 逆向全球化:西方国家的认同危机[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5):32-40.

## Deglobalization: Identity Crisis in Western Countries

JIANG Ning-k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deglobalization has spread over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n irrational response to the fierce challenges from global markets and syndrome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In a new world order of post-western era, the trend of deglobalization cannot turn dow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ut may lead to more setbacks suffered by these countries in their domestic identity split and social conflicts.

**Key words:** deglob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post-western era

在曾经力倡经济全球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中,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强劲的逆向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思潮。这股思潮具体表现在近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例如英国脱欧公投成功、美国新总统的贸易保护和反移民政策、法国总统大选中的极右翼势力崛起、德国及意大利的难民政策激烈辩论等。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一贯宣扬的贸易自由、人权关怀、国际合作等原则立场成为这股思潮的摒弃对象,因此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和抵制全球气候治理等成为一些西方政府的最新国策。这一思潮的背后是多年积累的白人民族主义和社会民粹主义正在高涨,其矛头所指则是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市场竞争和

**收稿日期:**2017-05-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启蒙文学经典与国家认同研究”(16AWW003)

**作者简介:**江宁康,男,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全球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文学经典形成机制研究。

世界民主秩序。文章意图分析这股思潮的远缘近因,剖析其导致西方国家认同危机的因果关系,指出其实质是西方霸权失落后出现的一种非理性焦虑症候,是其国内社会矛盾和认同解体的突出表现。

## 一、新世纪全球化进程与西方逆转

自20世纪末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势头在世界各地蔓延发展,到了21世纪初更是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推动下改变了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面貌。由于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的推广,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体化的大市场,资金、商品、人员和技术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构成了国际秩序的新景观。在21世纪初,不少西方学者一度认为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前景大好,因为“美国已经大大受益于全球化,并因此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支持者和管理者”<sup>[1]</sup>。事实数据也显示了当时的西方经济强盛图景。例如2000年的世界GDP总量为33.2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GDP为10.3万亿美元,日德英法意加等六国的GDP为11.5万亿美元,即西方七国(G7)的GDP总和是21.8万亿美元,占据当年全球GDP总量的65.5%;而当年中国(1.2万亿美元)、巴西、俄国、印度和南非(即后来所称的金砖五国)的GDP总和仅为2.7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8.2%。同时,2000年《财富》所列全球500强企业中,前50名全是美欧日等地的跨国大公司,而在500强排名靠后的位置上只有9家中国公司上榜,占比不到2%。<sup>①</sup>正是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影响很大的《帝国》(2000)一书作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指出,全球跨国公司巨头利用全球化进程来实现资本帝国的统治,“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有效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国家已被击败,而公司现在正统治着地球!”<sup>[2]</sup><sup>355</sup>在他们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正是通过跨国公司削弱了各民族国家的约束,从而形成了新的全球帝国统治,而经济全球化则是西方大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有效途径。

可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求各国的资本、商品、人员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是跨越国界的,并且把全球气候、环境和反恐等视为国家间协商处理的紧迫问题。这也意味着各个国家都要遵守共同的国际市场规则,参与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协商互动,放弃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或单边主义的狭隘政策。最重要的是服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放弃世界霸权的政治迷思。从倡导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视野中看,当今的全球化进程在思想上延续了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世界主义思想,把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观念提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高度。在全球市场关联紧密快捷的今天,全球化进程也意味着世界各国需要在同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但是资本的趋利性往往导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税负和人工成本而让资本流向国门之外。这种资本外流既是跨国公司巨头扩大利润的重要手段,也是全球资源和市场重新分配的推动力量。在这样的环境中,曾经的霸权无法固步自封,因为国际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机制对于勤劳奋发的民族是一种奖赏,而对于懒惰保守的民族则是一种惩罚。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遇到了非西方国家崛起的强劲挑战。格卡伊等人在2012年指出,以英美为轴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衰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新兴集团正在出现,“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当前系统性危机边缘隐隐闪现”<sup>[3]</sup>。如果说,当时人们对全球化趋势还看不清楚的话,那么,近年来的经济数据可以说明格卡伊等人的观察没有错。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西方七国的GDP总量是35.98万亿美元(美国18.59万亿),占世界总量75.28万亿美元的47.8%;而金砖五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8.13万亿美元(中国11.2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4%。在《财富》列举的全球500强中,中国的大企业就达110家,占比达到21%,而在前50强中,中国

<sup>①</sup>人民网北京4月29日讯:“2000年《财富》全球企业500强排行榜”,见 <http://www.people.com.cn>(2001年4月29日)

占有12席,占比达到24%。<sup>①</sup>这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有效地说明了世界经济形势的东西方力量转化,而这些重大的变化正是西方逆向全球化思潮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2014年4月7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拉纳·弗鲁哈尔的《全球化逆转》文章所云,“至少从目前形势看,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逆转”<sup>[4]</sup>。弗鲁哈尔使用了“逆向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一词来提醒人们,西方国家近期非议全球化的原因在于,非西方经济的崛起正在迅速地挑战西方曾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宰地位,或者如格卡伊所说是新的全球秩序对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形成了挑战,因此西方国家意图逆转这一“反噬”趋势,维护既有的帝国霸权。

近期的逆向全球化思潮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付国内经济低迷和国际激烈竞争的一种权宜手段,而且是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的一种危机症候。在欧洲,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地的保守集团或极右势力要求退出欧盟,驱逐移民,抵制全球自由贸易和世界气候公约。在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去全球化主张更是激烈。特朗普提出,要以国家保护主义来反对国际自由贸易,以美国优先的立场来重建国际经贸合作,要减少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干预,严厉控制移民特别是穆斯林难民的流入,而他的支持者甚至主张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和联合国等极端的要求。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防止其他国家的掠夺,这些国家正在生产我们的产品,偷走我们的公司,毁掉我们的工作。保护主义将使我们走向伟大的繁荣和强盛。”<sup>[5]</sup>这一番激愤演说抨击的对象正是跨国公司巨头、新近崛起国家和全球市场机制,其主张的保护主义政策明确显示出逆向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意图,而实质却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国家治理出了问题,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在对外政策剧烈转型之时,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要面对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失业、犯罪和经济低迷等造成的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些现象在其本质上还是社会失序的症候,尤其是贫富阶层差距不断扩大所造成的矛盾。在族群矛盾、宗教矛盾、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矛盾、精英和大众矛盾等现象的背后,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衰落,统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身份认同出现裂变和冲突。人民不再相信政府和资本的所作所为,他们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安全而质疑国家认同的政治正确性。例如在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许多参与者认为“在大西洋两岸,政治经济精英们已经使维护平安和造福全民这两个根本的意识形态支柱信誉扫地”;在2012年举办的一次皮尤(Pew Poll)民意测验也显示,77%的受访者认为极少数富人和大公司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另有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经济体系不公正地使得富人获利<sup>[6]</sup>。可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近期出现的逆向全球化思潮虽然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实质上却是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族群矛盾和文化矛盾尖锐化的反映,而这些矛盾的不断加剧和公开化则直接导致了国家认同的裂变危机。这种认同裂变在思想观念上主要表现为左翼和右翼政治主张对立的尖锐化,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高涨而精英主义的普遍人权观念消退。在经济上表现为国家利益至上而排斥全球合作发展,维护本国经济发展而不顾全球市场运行规律。在社会秩序上则表现为白人群体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对立,而这种对立经由民粹主义的发酵甚至导致新的种族主义和宗教冲突。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不少西方国家的本土居民和近期移民不再对所居住国抱有共同的认同立场,不少本土居民在民粹主义情绪影响下放弃了普遍人权的原则而排斥外来移民,而外来移民或难民又因为受到了歧视而产生了怨恨心理。在各国经济并不景气的形势下,本土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产生了近乎生存竞争的敌对态度。在思想观念上,不少本土居民认为国家和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利益免遭外

<sup>①</sup>人民网北京7月22日讯:“2016财富500强榜单出炉,110家中国公司上榜”,见 [http://www. people. com. cn](http://www.people.com.cn) (2016年7月22日)

来移民的侵害,所以普遍人权不应该高于国家主权;外来移民或难民则往往苦于自身困境而发展出极端主义的反社会心态,造成各种社会犯罪和暴力冲突。在这方面,德国处理中东难民的政策变化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对于从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涌入欧洲的众多难民,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采纳了普遍人权的观点,认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普遍人权高于国家主权的主张,因此接受了很多中东地区的难民。但是默克尔很快认知到,经济的、宗教的和政治的矛盾导致德国民众对于外来他者的不安,少数难民的反社会犯罪行为又加剧了本土居民的抵制意愿,于是为了弥合国家认同的分裂,她采取措施加强了难民入境的人数限制和背景审查。但是,对于已经容纳了过多的外来移民或难民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加剧只会激化其反对全球化的态度,特别是对人员迁徙自由和文化多元共存等全球化意识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

## 二、全球化思想的渊源与认同危机

从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史来看,与全球化相关的思想理念来自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世界主义观念。古希腊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和犬儒学派代表人物第欧根尼都主张,自由地跨国旅行交往是人类社会的需要,而城邦国家的地域疆界却限制了文明的传播;前者于是提出“全世界都是我的故乡”,后者则宣称“我是世界的公民”。古罗马斯多葛派创始人塞内加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等人也对世界主义有所论述,形成了初始的世界主义思想谱系。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人理解到,世界的边缘始于自己脚下的国度,因为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因此从这一边缘出发可以周游世界并返回此地。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以后,西方人的民族国家意识迅速觉醒,但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跨国商业贸易,并在乌托邦思想影响下逐渐产生了世界主义的大同意识。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各国文人学者经常游历各国,或为躲避贵族君主的迫害,或为交流传播启蒙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了“文人共和国”和世界主义的思想(Republic of Letters and Cosmopolitanism)。康德在1784年撰写的论文《世界主义视角中的环球史观念》中提出,世界主义和跨国自由贸易是通向人类社会持久和平的理想之路。康德的论述把世界主义理想和国际自由贸易联系起来,显示了经济全球化愿景的萌芽观念。当代历史学家纳斯鲍姆梳理了从第欧根尼到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脉络以后认为,为了获得和平与正义,“我们就不应容许民族、阶级、族群或性别差异在我们和其他人类伙伴之间竖起隔墙”<sup>[7]</sup>。这就清楚地阐释了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全球视野,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理想。正是源于世界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传承,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社会变革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18世纪以来大力开拓了全球市场,为经济全球化的实施做出了许多努力。经过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硝烟和科技进步的洗礼,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起步。《全球化简史》的作者艾利克斯·麦克杰弗雷指出,“全球化”一词首先出现在1892年的《哈珀斯杂志》上,由法国人沃古耶在一篇游记文章中使用,1961年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收录了“全球化”一词。但只是在冷战结束打破了东西方藩篱时才使世界市场完整建构起来,而此时由于美国的霸权独大导致“许多人断定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殖民化或美国化的代名词”<sup>[8]10</sup>。

确实,冷战后东西方对峙格局解体和信息高速公路建立使得世界各国互相依存度日益加深,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参与下,尤其是美国霸权的主导下,全球金融市场、国际贸易组织与跨国公司巨头等形成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所谓的新型帝国势力,“今天,帝国正作为一种中心出现于世界,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置于它的世界秩序之下”;而海湾战争则标志着布什所宣称的“新世界秩序的诞生”<sup>[2]210</sup>。当时在十分乐观的氛围里,许多

西方政要不断强调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围墙的世界”,在各民族国家间“形成不可抗拒的贸易和信用的纽带”<sup>[9]</sup>。这种说法似乎与康德所谓的世界主义理想异曲同工,是在为全球化的进展而呐喊。但是,这些言说实质上却是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提供了话语的合法性,促使西方霸权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而在世界各地扩张开来。事实上,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G7国家的经济实力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国际政治文化上,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进程做出了西方阐释,从而把全球化进程的话语转变成为西方化、美国化进程的言说。在这样的语境中,西方人的国家认同和全球意识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话语,而西方人长期形成的文化中心意识更是加强了对于全球化乐观其成的心态。对于作为西方发达国家领导者的美国政治家来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是把美国价值观念推向全球的重要途径。正如卢赛尔·邓肯等人所指出的,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对其他国家制定了借款规则,由此来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方式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当全球化进程由西方老牌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势力所掌控时,那就成为一种破坏性和剥削性的体制”<sup>[10]137</sup>。邓肯的分析十分深刻,而实际上21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对于消解民族国家意识、宣传全球一体观念大多抱着肯定的态度,并借助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积极推进全球化的市场机制。

然而,经济全球化在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以后,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为了减低成本、获取利润而在全球寻租。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工资薪酬降低了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进而导致资本和技术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转移。西方大国在这种全球竞争形势下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于是采用了金融投机的方式来制造虚假繁荣,并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大举借债。例如早在2005年,美国所筹借的国际债务就接近当年GDP的30%;金融资本的投机代替了制造业的增长,金融利润达到全部利润的40%,而制造业的利润不到15%<sup>[10]240</sup>。过度金融投机很快导致了金融危机,即2008年从美国开始向其他西方国家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由此导致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例如欧盟成员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地的经济低迷,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地的失业率上升,诸如此类经济问题导致了国内民众对于国家认同的分歧和抵制。2011年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内部危机的集中体现,而中东和非洲等战乱地区产生的数百万难民涌入欧美诸国进一步激化了其国内既有的社会矛盾。

与此同时,非西方国家经济的崛起通过全球化竞争机制进一步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西方和非西方(West VS Rest)之间经济力量的对比转化,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传统东方国家的经济崛起给西方社会造成巨大的挑战。这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化发展的悖论:民族国家为了自身经济发展而支持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则民族国家经济越受其影响,此时的新兴国家力量很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大对手;当原先的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国内外因素影响而失去竞争力时,他们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契约就产生了矛盾冲突,他们的国内福利体系和社会开放政策难以抵挡全球化带来的世纪挑战,而空洞的价值观说教并没有扭转这种非西方资本对于西方国家的“反噬”趋势。于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西方国家对于全球化的言说就不再那么乐观,曾经宣称历史终结的福山也改口认为历史尚没有终结。在近来的西方政治文化语境中,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受到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批评或攻击,保护国家利益成为逆向全球主义的合法理由。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来看,不管是英国脱欧还是特朗普新政,其实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了全球市场竞争的挑战,然而他们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意识或帝国意识却遮蔽了其认知真相的理性眼光。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裂变和社会矛盾激化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例如西方国内左右翼政治力量的矛盾,

人种族群之间的矛盾,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重要事件,如法国大选期间出现的“两个法国”论,美国大选前后出现的建制派和民粹派之争,英国脱欧所导致苏格兰独立势力再起等,这些都显示出西方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治认同产生了危机。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选择的解决之道却是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极端措施。在一度高调宣传普遍人权和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欧美诸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取代了全球共治的理想。如果说,英国脱欧支持者反对自由跨国旅行的申根条约有着维系国家领土安全考虑的话,那么,美国近期废止国际多边条约、禁止若干穆斯林国家移民和启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新政却发出了明确的排外主义信号。帕特里克在最近一期《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特朗普和世界新秩序”一文指出,特朗普“明确表示他要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以此指导他的政策,显然不顾这会对1945年以来美国所支持的自由世界秩序产生冲击”<sup>[11]</sup>。帕特里克的看法批评了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狭隘国家主义的立场,针对性地指出美国在处理国家利益和世界秩序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倒退。他的批评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如法国、荷兰和奥地利等地极右翼势力也是有针对性的,而正是这些西方政治势力(不论是执政还是在野)的逆向全球化言行告诉人们,西方国家认同正在遭遇严峻的内部分裂危机。正如近期《纽约时报》网站的一篇文章所警告的,“共同的国家身份认同感正在分崩离析,美国正在丧失国家身份认同”<sup>[12]</sup>。正是这种国家认同的危机才是当今西方国家面临的最深刻挑战,而逆向全球化思潮却是以错误的全球经济政策来处理复杂的国内社会问题。

### 三、后西方时代的一次全球化事件

逆向全球化思潮和国家认同危机主要产生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其在数百年来全球化历史中只能算作一次重要的进程事件,却不可能真正逆转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简史》的作者乐观地认为,“民族国家正在复兴,而全球聚集增强了它们的力量去寻找支点来处理全球交易,而信息技术的新进展必将使得多民族全球治理成为可能”<sup>[8]290</sup>。如果我们重温马克思有关世界市场的论述的话,就会感到上述看法是有道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过,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疆域门户势必随之开放,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势必产生重大的变化: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sup>[13]</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是对今日经济全球化形势的一种预见,也是对世界、全球、民族和国家之间现代经济关系的精辟概括。当今世界的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在规模上和速度上都极大地超过了19世纪的水平,而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从那时以来就不断地消亡或转型。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证明全球化进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各种国际战乱、帝国解体或社会革命都只是一时延误了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完全阻断其发展的延续。所以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向全球化思潮只是一时的现象,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难以持久生存下去。

如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不断适应了全球市场机制,所以西方国家必须摒弃霸权思想或西方中心主义,适应后西方时代的世界新秩序,维护并完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这才能克服

各种现实困难,促进本国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近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逆向全球化思潮虽然有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支持,但在这些国家的诸多政要话语中,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言词之下却包含着自我身份的认同焦虑,隐含了国家内部社会分裂或冲突的危机意识。从近现代世界历史演变的视野中看,西方发达国家似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非西方国家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不是由两军对垒式的武装冲突引起的,而是在西方长期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突然遭遇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了全球新兴资本力量的强劲挑战,由此而产生了丧失霸权优势和畏惧全球竞争的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考虑“后西方”时代的来临。尽管从“西方主导”到“后西方”的时代话语转换似乎有点突兀,但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却不会因为一时局部逆流而停止,西方和非西方(West & Rest)也将在全球合作中相互助力、共同进步。在一个信息化日益普及的全球村里,世界市场的运行规则将促使民族国家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与更新,以便获取更多的市场机遇和竞争优势,更大程度地赢得实际的国家利益,更好地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利益。

但是,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逆转事件确实反映了相关西方国家的认同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扩大又是现实社会各类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西方国家认同裂变甚至解体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即国家利益和全球治理的冲突,国家统一文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白人群体与非白人群体的社会冲突,新左翼群体与极右翼势力的冲突,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基督教社群与伊斯兰教社群的冲突等等。从思想观念上看,近期西方国家认同的危机集中体现在国家发展繁荣与世界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杰克·希特林等人认为,“对于增强国家认同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全球化,……不管全球公民权或人性普遍之爱如何有益处,‘一个世界、一个家庭’的人道主义理想在目前似乎过于空泛,其在感情上的吸引力并不能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求”<sup>[14]</sup>。这就是说,人道主义理想或普遍人权观念并不能解决有关国家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解决失业率居高和暴力犯罪等紧迫社会问题没有什么帮助,也更不会解决深刻的国家认同危机。希特林等人的忧虑来源并非理论上的论述推导,而是来自于对西方诸国国内社会矛盾和威胁的深刻观察。例如,近期欧美多国发生了中东难民或移民极端分子与本土白人群体的暴力冲突,其中有在德国发生的中东男性难民强奸当地女性事件、瑞典出现的中东移民卡车撞人事件、美国加州的非洲裔枪击白人事件和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袭击警察事件等等。这些犯罪实例集中折射了族群矛盾、宗教矛盾、左右翼矛盾以及开放和闭关等多重社会危机,其严重后果是在相关国家内部直接造成了阶级、社群和文化的认同分裂,进而使国家权威和统一身份遭到削弱和破坏。直截了当地说,这些矛盾冲突甚至将会引发西方国家的大规模内乱等现实危机,就像20世纪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反叛运动那样。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2004)这本书里分析过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危机源头。他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反叛运动推动了美国认同的解构,其主旨是“把宪法上的单数美国人民改写为美国‘各族人民’。他们主张在法律上承认各群体的权力和种族权力,使之居于‘美国信念’强调的个人权力之上。他们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其效果就是要使三百余年来逐渐建立起来的美国认同解构,让亚民族认同取而代之”。而由于“亚民族身份在全球崛起,在世界各国都引发了国家认同的危机,这是与经济全球化以及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大发展相关联的”<sup>[15]</sup>。亨廷顿的看法指出了西方发达国家认同危机产生的一种根源,即多元文化和多族群认同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承认了全球化进程对于西方白人文化主导地位的巨大挑战。亨廷顿代表的是白人保守主义价值观念,他主张在盎格鲁-美利坚-新教观念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尤其反对拉丁裔西班牙语族群对于美国认同的分裂倾向。他的论著为今日西方逆向全球化思潮提供了相关的理论话语,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白人殖民主义或帝国霸权思想已经好景不在,而世界市场信息化和非西方国家崛起等历史进步必然使得全球化进程不

可逆转。

雅克布·赫尔布鲁恩在近期的《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指出,特朗普关于退出全球化和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实际上是在重复一个老问题,即美国建国之际就出现的孤立主义政治,这在19世纪初和20世纪初的美国外交政策中都有体现。他认为,近年来最先反对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声音来自亨廷顿的论述,因为亨廷顿认为那些嘲弄国家和传统的“金领工人”(即金融精英)“没有什么国家忠诚感,视国家边界为正在消失的障碍物,国家政府是过去的残余物,其仅有的职能就是推动精英们的全球行动”<sup>[16]</sup>。确实,近期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向全球化等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主要来自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危机论等著述。这些论著出现在1996年和2004年,但是它们系统地阐释了今日欧洲极右翼保守势力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等政治文化的理论脉络,其中也形成了今日逆向全球化思潮的重要思想来源。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看,这种思潮的根源在于西方霸权逐渐失落之际产生的国家认同焦虑甚至解体、世界秩序的重组和后西方化,而其症结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认同和全球治理之间关系上产生的不安、困惑和恐惧心态。这种心态对建构后西方时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没有任何益处,正如赫尔布鲁恩的文章所指出的,“特朗普已经当选,但是二战以后帮助美国取得全球优势的格局安排正被质疑。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已经在华盛顿退却为一种内部流放的形式”<sup>[16]</sup>。这段话其实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逆向全球化思潮正在引发西方主流思想观念的内在分歧,在其国内政治生态上造成了重大的冲击,而世界秩序的重组正在引起这些国家内部社会认同的分裂。

工业革命以来数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一直由西方大国所主导,如今开始出现了“后西方”的时代转折,即在西方主导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发展数百年以后,非西方国家开始整体性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崛起,并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形成了现实的挑战。对这种转折的认知在后现代思潮兴起时已经出现,即罗蒂所谓的西方文明对全球社会的救赎已经力不从心,而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西方已经穷尽了它的各种可能性”<sup>[17]</sup>。但是,正如21世纪以来后现代思潮已经逐渐消退那样,逆向全球化思潮也将逐渐消退,因为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拒绝接受移民、强制跨国公司内迁、反对多元文化、抵制国际义务如全球气候和环境条约等措施并不能解决其国内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正如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提示人们的,采用闭关自守的政策来逃避世界市场的竞争,在全球信息网络和跨国资本流动日益迅捷的时代无异于经济自杀。所以说,如今的逆向全球化思潮只是一次短暂的历史事件,它不会阻遏全球化进程的继续发展,但是却会对相关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威胁,甚至产生难以预料的社会政治后果。

#### 四、结 语

欧亚集团主席依安·布莱曼在2009年写了一篇文章提出,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对于西方主宰地位形成了挑战”,且“一种新的全球竞争被触发,这种竞争不是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而是在对立的经济模式之间进行的。一种全然不同的输赢模式正在形成”<sup>[18]</sup>。布莱曼的看法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化进程的真实状况,也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国家认同危机和逆向全球化形成的深层原因。实际上,西方文明在殖民主义时代一直在制造自己的对立面,即非西方的他者;一旦这个他者借助全球化进程而日益壮大起来以后,世界格局就不应该是西方主宰或一国独霸的情势,而应该是各国平等、合法竞争、民主共治的局面。如果西方人能够形成这种“后西方”时代的全球治理共识,那么他们各自国家的认同矛盾和心理焦虑就会得到缓解,不会使一些国家的政要在“要么独霸”“要么闭关”的非理性心态中犯下战略性的错误。从近现代世界史的视野中看,逆向全球化思潮是21世纪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焦虑症



候,是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市场和国家利益之间矛盾冲突的体现,其实质是西方长期主宰的现代国家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削弱导致了自身抗拒性反应。由于当今世界格局的重心已经开始转移,西方国家必须调整自身的政治文化心态,顺应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正确对待新兴国家崛起形成的市场竞争,采取理性的国内外政策以避免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唯有如此,逆向全球化思潮才不会发展到相关国家社会认同解体的危险处境。

####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库普乾. 美国时代的终结[M]. 潘忠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8.
- [2]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M]. 杨建国,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3] 比伦特·格卡伊,瓦西里斯·福斯卡斯. 美国的衰落[M]. 贾海,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7108.
- [4] FOROOHAR R. Globalization in reverse[J]. Times,2014, April:7.
- [5] DONALD T. Trump's full speech[EB/OL]. (2017-01-21) [2017-04-20]. <http://edition.cnn.com/2017/01/20/politics/trump-inaugural-address/>.
- [6] GITLIN T. Occupy nation[M]. New York:Harper Collins Books,2012:219-223.
- [7] LUTZ T. Cosmopolitan vista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51.
- [8] MAC GILLIVRAY A. A brief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M]. 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6.
- [9] MAC GILLIVRAY A. Globalization[M]. New York: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7:4.
- [10] DUNCAN R, GODDARD J. Contemporary America[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 [11] STEWART M. Trump and world order[EB/OL]. (2017-04-05) [2017-04-2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
- [12] 罗伯特·琼斯. 美国身份认同的崩溃[N]. 参考消息,2017-05-08(10).
- [13]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
- [14] CITRIN J, DAVID O.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5-6.
- [15]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M]. 程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20-121.
- [16] HEILBRUNN J. Here comes fortress American[EB/OL]. (2017-04-13) [2017-04-20]. <http://nationalinterest.org/>.
- [17] 理查德·罗蒂. 哲学、文学和政治[M]. 黄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0.
- [18] BREMMER I. State capitalism comes of age[J]. Foreign affairs,2009, May/June, Vol. 88:41.



(责任编辑 杨文欢)